



论翻译的默会维度

杨晓波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以迈克尔·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为视角来考察翻译,可对翻译的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波兰尼所谓的“默会”具有多层含义,包含不可道的、心领神会的、隐含的、不可逆的、不可传授的及不可批判的含义。从本质上讲,翻译不仅具有默会的维度,而且该维度具有基础性与优先性。具体而言,翻译的本体、过程与习得都是默会的。道家的“不可道”的观点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既有相通之处,二者又互为补充,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翻译的学科属性进行考察,可得出如下结论:翻译总体而言是一门艺术,它不同于科学,好的翻译力求达到形而上之“道”的境界,而差的翻译则沦为形而下之“器(技)”。

关键词: 翻译;默会;迈克尔·波兰尼;道;学科属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2-0016-07

On the tacit dimension of translation

YANG Xiao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Michael Polanyi's theory of tacit knowledge can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Tacit" in Polanyi's theory has multiple meanings, including ineffable, implicit, irreversible, unteachable and Acritical. In essence, translation not just has tacit dimension. Besides, the dimension has the properties of fundamentality and priority.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ontology, process and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are all tacit. The ineffability view of *Dao* could be combined and supplemented with Polanyi's theory of tacit knowledge. The two were combin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cipline attribut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in general,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art, different from science. Good translation would embody an attempt to achieve the realm of *Dao*, while poor translation might be reduced to the level of *Qi* (merely a poor display of skills).

Key words: translation; tacit; Michael Polanyi; *Dao*; discipline attribute

目前的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翻译的外围研究(又称外部研究,或称文化研究)占主导的。现代翻译学的基本框架最早由霍姆斯(J. Holmes)在其《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提出。图里(G. Toury)将之概括为一张图^[1-2],该图反映了时至今日翻译学仍具有的基本内容与任务。根据该图,翻译的“外围研究”占了大半壁江山。而潘文国教授注

意到,“有两个方面,霍姆斯提到了,但却没有放进他的框架。一个可说是翻译学‘学’,即对翻译学自身的研究,……另一个是学科方法论,即何种方式或模式最适合学科中的何方面的研究等。”^[2]以上两个方面即翻译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其中本体论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法论。然而,翻译的本体研究总是借助语言学、文学、哲学等理论不

收稿日期:2019-04-30 网络出版日期:2020-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X010);浙江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创新专项”(2019Q106);浙江理工大学品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dbts201603)

作者简介:杨晓波(1981—),男,浙江杭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与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

断被提起,又被放下。“虽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呼吁回归翻译本体的译学研究,但对于翻译本体到底是什么,却缺乏充分的说明。”^[3]翻译的外围研究虽扩充了翻译学的领地,但不少学者担心,过度的外围研究反而易导致翻译学泛化为“无学科(a-disciplinary)”的属性^{[3-4][5]6}。因此他们呼吁“对外围研究进行适当的限制,加强对翻译本体的研究”^[3],“必须直面翻译学最根本的问题:翻译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相应的方法论”^{[5]2},并认为“只有回归翻译本体才能建立真正的翻译学科”^[4]。

鉴于此,本文借助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年)的默会认识论来重新认识翻译本身。笔者认为翻译不仅具有默会的维度,且这一维度具有基础性和优先性。从这一论点出发,本文首先论证了翻译的本体(即翻译为何、翻译成其为翻译的基础)、翻译的过程及翻译的习得皆是默会的;接着用道家的“不可道”与“道”论将默会认识论作一些引申,来探讨翻译的学科属性问题;最后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它不同于科学,且高于形而下之“器”层面的“技”。

一、默会认识论

为讨论方便,本文先勾勒一下默会认识论的要旨。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是对在西方长久占统治地位的言述知识观的反叛。言述的(articulate)与默会的(tacit)是两种不同的知识(knowledge)或识知(knowing)形式。言述的,即可用语言表述的,或者说是命题性的。“长期以来,英美流行的认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命题性知识之上,把知识理解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种理解其来有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6]4}然而,自近代以来这种言述的认识论却一直遭到质疑。主客体的分离以及极端的科学主义、客观主义、机械论和怀疑论的产生都与它有关。为走出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波兰尼提出了默会认识论。默会的与言述的正好相反,它指的是不可用语言表述的、靠心领神会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挑战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多种根深蒂固的教条或成见”^[7]。

波兰尼是一位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即提出了默会认识论,其代表作《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科学家出生的波兰尼在书中首先对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科学排除不了人的参与。按照他的论述,

人的参与包含如下几种形式:一是对识知对象的审美;二是求知的热情;三是个人的趣味、鉴赏力与领悟力;四是个人的操作、观察与判断。波兰尼得出的结论是,“通常被认为是精确科学所具有的完全客观性是一种错觉,并且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的理想。”^{[8]21}

波兰尼引入认知的个人参与,便引入了认知的默会维度。首先,审美、热情、趣味、鉴赏力与领悟力是认知的前提,它们“内居(indwell)”于认知活动中,而至于为何觉得认知对象是美的,并对其充满热情,个人的趣味从何而来,又如何鉴赏与领悟认知对象,这些都是不可言传的。其次,个人在操作、观察与判断中对认知对象有两种意识(或者说知觉方式):焦点意识(focal awareness)与附属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波兰尼举了一个锤钉子的例子:锤钉子时,我们注意力的焦点在钉子上,并附带对手掌的知觉有所意识。聚焦于钉子或把钉子敲进去这一目的的意识,即焦点意识;而在实现此目的过程中,对手臂动作的轻重缓急与对手握工具的感觉,则为附属意识。附属意识属于一种默会知识,它同时也是焦点意识的基础,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不可言传,而是“在逻辑上不可言传”^{[8]66},因为其并非不可知,而是若将其转化为焦点意识,便又会产生新的附属意识,而我们的行为也会因此崩溃。例如,锤钉子时若将注意力的焦点转移到自己的手掌,反而会砸到它。最后,对默会认识基础地位的承认,实则承认了认知的“信托纲领(fiduciary programme)”,即对社会中一些由文化积淀而形成的认识的信任与信念。正如波兰尼所言,“我们的默会能力决定了我们对某一特定社会的依附并在这一社会的框架中维持着我们的求知、艺术、市民和宗教的安排。”^{[8]314}认知归根到底基于信念、传统、权威及已有的认知框架,因此彻底的怀疑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默会”一词按字面可理解为不可用语言表述及心领神会的,然而从波兰尼的理解来看,它还有更多含义:意为默许的、隐含的,同时也是不能通过命题表现的,因此它还是不可逆的,不能通过书本传授的,也是具有“不可批判性(a-critical)”的^①。默会认

① 波兰尼区分了“没有批判性(uncritical)”与“不可批判性(a-critical)”,前者是相对于“有批判性(critical)”而言的,但不论 critical 还是 uncritical,波兰尼认为,“只能被应用于言述形式,……[而不能]应用于默会思维本身,如同我们不会谈论跳高或跳舞是有批判性还是没有批判性一样。”^{[8]313}也就是说,默会层面的东西是无所谓批判不批判的,我们既不能去批判它,也不能不去批判它,确切地说,它是我们进行批判的基础。因此,所谓 a-critical,可理解为与批判无关的或无涉批判的。

识论不但主张人类知识与知识具有默会的维度,且主张这一维度的基础性与优先性。这一主张实则高扬了人的主体性。

二、翻译的默会维度

(一)翻译的本体是默会的

首先考察翻译的本体,即翻译究竟为何,也就是让翻译成其为翻译的基础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争议:翻译究竟是向原文的趋近还是背离?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前者,而文化派则主张后者。正如文化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A. 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所言,“翻译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种改写形式”^[9]。不管是改写还是操控,都是对原文的背离,不过还需分清背离的两种情况,即区分背离是翻译的目的还是结果。若是目的,也就是说乃有意对原文进行操控与改写,那么不妨称这类翻译为节译、改译或编译,它们还有一个不太动听的名字——伪译。所谓“伪译”,即图里所谓的“虽在目标文化中被视为翻译,却没有与之对应的真正源文本存在”,拉多(G. Radó)甚至认为伪译“因过度偏离源文本而不能视之为翻译”^[10]。

从图里与拉多的定义中,似乎难以判断“伪译”究竟是作为翻译的目的还是结果产生的,但笔者认为这两条定义的措辞偏向于前者。不论如何,笔者认为“伪译”是有意对原文进行的操控与改写(即视操控与改写为翻译的目的);而无意中(作为结果)产生的与原文本差距较大的译文,应视为“劣译”,也就是不合格的翻译。笔者之所以认为应将“伪译”排除在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之外,乃因后者是以趋近原文为指归的,或者说是趋近原文的一种努力,尽管不论译者如何努力趋近原文,结果总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操控与改写。然而,翻译的结果包含操控与改写并不等于翻译就是操控与改写^{[4][5]7-8}。赵彦春^{[5]7}认为,文化派将翻译等同于操控与改写便“自然而然地抛弃了翻译的基本要求——‘忠实’和‘对等’”。实际上,这未必是文化派的本意,因为其初衷是将操控与改写视为翻译的结果来进行描写性研究。但赵彦春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笼统地将翻译说成是操控与改写(不区分目的与结果)易让人误读为翻译可舍弃忠实的标准,从而对翻译实践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有学者担忧,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不负责任乱译的借口;这种观点“随意夸大译者的‘主体性’,宣扬对原作的‘叛逆’,片面论述‘叛逆’的‘创造

性’的正面价值,而无视叛逆的‘破坏’作用,从而触动了‘以信为本’这一翻译活动的基本伦理”^[11]。

此外,操控与改写即便作为翻译结果而无意识为之,亦突显了译者的主体性。波兰尼以大量篇幅论证科学实践不可避免人的因素,以此引出其默会认识论。而主体性在翻译中是毋庸置疑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译者作为主体,其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默会的。在此不妨来考察一下翻译实践得以开展的基础。笔者认为,译者在翻译之际必须相信原文是有确定意义的,是可译的,并已准备好向原文趋近。当然,文化派会质疑说结果恰恰相反:原文的意义根本不是确定的,因为一种原文可有多种译文,而每一种译文只能传达原文的部分意义,因此不可译乃常态。如此看来,翻译中似乎不存在确切无疑的通衢大道,有的只是让人踌躇与困惑的岔路和迷宫了,这不禁让人相信翻译是对原文的背离。

然而,笔者仍坚信,对意义确定性的信念及向原文趋近的热情乃翻译实践的基础,并让翻译成其为翻译。它们是翻译的“信托纲领”,具有“不可批判性”,只能无条件接受。在此需要分析一下翻译的背离,翻译可有两种形式的背离:第一种以确定性为基础,好比先解出答案,然后对其进行改造;第二种则无需任何确定性,好比解不出答案,因而胡编乱造一个。第一种情况实际上仍包含向原文的趋近;而第二种情况则根本不算翻译,不然翻译之名便蕴含了一对矛盾,即同时蕴含了肯定(向原文趋近的努力)与否定(未向原文趋近做任何努力或有意背离原文)两个不可调和的命题。显然,向原文的趋近需要一种努力,第二种背离则无需或甚少需要努力,而翻译行为的意义恰恰是由这种努力赋予的,正如伦理学将向善、而非向恶视为生活的意义,因为“惟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努力才使得目的与过程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才使得目的赋予整个过程以及每一步以意义”^{[12]234}。因此,在翻译中彻底怀疑翻译的确定性,就好比自己宣称自己没有说话一样,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其实,译者也无须宣称自己在说话,因为它已“内居”于译者的实践。上文所谓的翻译的“信托纲领”,即对于翻译确定性的信念以及向原文趋近的热情,它们“内居”于翻译行为之中,并赋予翻译行为以意义。

(二)翻译的过程是默会的

接下来分析,在“信托纲领”下翻译实践是如何具体展开的。默会认识论将认知描述为 from-to 的动态结构,即认知主体从(from)“附带意识”转向

(to)“焦点意识”。“不同于格式塔心理学,波兰尼强调,默会认知不是一种被动的经验,而是认识者积极主动地发挥其默会能力的过程。”^{[6]60}而主体性在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况且,翻译是远比锤钉子复杂得多的行为,因此“from-to”也并非简单的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那么,翻译的焦点意识是什么呢?若是原文,那么如何解释译文的产生?译文难道不曾进入译者关注的焦点?若是译文,它在翻译过程中根本还未产生。笔者认为,既然翻译是向原文的趋近,那么每位译者都有对完美译文的追求,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并没有一种完美的译文等在远处让人追求。因此,翻译中焦点意识的对象并非完美的译文,而是“完美的译文”这一概念框架。但问题是,什么是“完美的译文”呢?不论用奈达的“最切近、自然的对等”,还是严复的“信、达、雅”等,都不足以描述,反而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对理想译文这一问题,笔者有两点看法:第一,理想译文有点类似“道”这类超级概念,是不可道,也是道不清的,但这并不妨碍各家的论道,且各家有各家的道论,因此这类概念其实是极其主观的。第二,理想译文寓于翻译实践,它不是现成之物,而是译者“心向往之”的概念框架,当译者使尽浑身解数,暂时不再有更佳选择时,他便称这一译文为“理想译文”。因此,翻译有点像量体裁衣,译者怀着“合身”的目的让服装初具轮廓,经过一次次试穿与修改后才最终合身。

如上所言,焦点意识是以附属意识为基础的,翻译过程中的附属意识包括对原文的理解与对目的语的选择。通常认为翻译过程包含两个步骤:首先理解原文,接着将其转化为目的语。其实这两项活动是同时进行的,难以区分彼此与先后。如果直接用目的语来理解原文,以一种“摸索行为(an act of groping)”不断斟酌,如临岔路,如入迷宫。波兰尼所谓的“摸索行为”指一种在试探中前进的努力,用它来形容翻译过程,便突显了翻译过程的四个特点:其一,正如摸索是一种向前的努力,翻译是译者向理想译文这一焦点意识努力的过程。其二,摸索是向未知世界的前进,是“无意识的尝试与出错之过程”^{[8]74},翻译也正如盲人用手杖探路,是不断试探与调整,不断将焦点意识与附属意识进行整合的过程。其三,摸索是一项“寄托(commitment)”行为,“当我们接受一套预设并把它们用作我们的解释框架时,我们就可以被认为是寄居在它们之中,如同我们寄居在自己的躯壳中一样。”^{[8]71}不过该比喻容易让人误以为寄托是封闭的,而实际上它是开放的、动

态的,是主体对两种知觉的整合:“在附属地知觉一事物以后,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并使它变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延伸。”^{[8]72}原作经过了翻译,就好比盲人获得了手杖,原文借助译文以一种新的方式向前摸索与延伸。其四,摸索行为是默会的,正如“你发现了游泳的方法但又不知其所依靠的是以特定方式调节你的呼吸”^{[8]74},翻译亦如此,两种知觉的整合没有既定的规则,即便有规则,也是事后总结的,即便记住了这些规则,其运用也另有规则,而应用规则的规则仍需规则……归根结底,规则的应用是默会的。

(三)翻译的习得是默会的

翻译的习得一般有三种途径:教材的研读、教师的指导及对名家名译的研习,其中第一种途径是言述性的。先来看看翻译教材能做些什么:它首先会告诉读者翻译的标准或目标,比如“信达雅”、“等效”、“神似”、“化境”(通常这些会被称为“标准或目标”);其次会教给读者各种实践的法则,比如语序的调整,信息的增损,主语、状语等的处理。实际上,翻译的目标都具有“不可批判性”,大家不会对其进行批判,说它们是错的,而至于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则莫衷一是。可以说,这些目标即翻译本身,它们和翻译构成重言式命题,就好比人们一般认为人生的目标即追求真善美,不会有人作相反的追求,但真善美究竟为何,则没有人能说清,而人们也不会等搞清楚它们的定义之后再去追求。人类按时代与传统塑造的真善美的观念去实践,然后将朝这个方向的努力称为真的、善的和美的,并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渐修正这些观念。可以说,实践活动的目的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在极端情况下,“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12]106}翻译亦如此。翻译即向原文的趋近(这点具有“不可批判性”,上文已论证)。因此,“信达雅”、“等效”、“神似”或“化境”已构成翻译本身,确切地说,良好的翻译本身就是去达到这些标准。这里强调的是“去达到”(意为一种努力与过程),而非“已达到”(意为结果),因为这些标准因侧重点不同而彼此略有差别,译者也因主体性而对它们的把握不尽相同,然而从译者向原文趋近的努力(也就是“去达到”的过程)层面来讲,这些标准的内涵是一致的。

因此,翻译与生活一样,靠的是实践智慧。“‘实践智慧’遵循的不变的定律或唯一原则是,在任何环境下都没有不变的定律或唯一的原则。”^[13]可以说,实践智慧靠的是对“度”的把握,“度”不是规则,而是规则的应用。正如李泽厚所言,“许多技艺便不是师

傅口授(语言)而必须在自己亲身实践中领会体验才能掌握。”^[14]越详尽的翻译教材,会提供更多的规则,但规则是无穷尽的,何况还有应用这些规则的规则,而应用规则的规则之上还有规则……从理论上讲,规则越多,离彻底的解释越近,而实际上,规则多到一定程度,会使教材臃肿不堪,难以卒读。翻译教材对翻译实践确实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它不是必要的,且仅限于初级阶段。那么,翻译的习得应该靠什么手段呢?

默会认识论认为,实践的智慧只能在实践中习得,这就好比游泳和骑车不是通过教科书学会的,而是靠“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庄子语)的实践,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未能很好地掌握那门技艺之实践知识的人来说,准则是不可理解,更是难以运用的”^{[8]36}。因此,翻译的习得一是靠名师的示范与指导,二是靠经典译本的学习与借鉴。即便像装配玩具这类较之翻译容易得多的实践技能,也很难通过文字说明使人学会,最好配以图示,若有视频就更佳,而最理想的条件则是行家的手把手指导。翻译也一样,没有一位翻译名家是教科书造就的。正如波兰尼所言,“一种无法被详细说明了的技艺不能通过法规而流传下去,因为这样的法规并不存在。它只能通过师傅教徒弟这样的传授方法流传下去。”^{[8]62}

然而,有时候译者身边缺乏名师,且名师也有自己的局限,这时译者就需要另一种示范,即名家名译。学习者通过这些范例习得的不是规则,而是成功运用各类规则的实例。规则的运用当然不能再依靠规则,它依靠的是判断力、审美以及对“度”的把握等默会知识。

三、翻译的学科属性

在剖析翻译的默会维度的基础上,本文将用道家的“不可道”与“道”论将默会认识论作一些引申,讨论翻译的学科属性问题。对该问题通常的争论是: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科学和艺术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范型与思维方式。虽然在波兰尼看来,一切知识和知识都是默会的,但艺术显然比科学更依赖于默会。艺术的创作、欣赏与习得都是不可言传的。而科学的发展、传播与论证则离不开文字,因此维特根斯坦^[15]认为只有自然科学命题才能说清楚,对其余的则应保持沉默。主体性在艺术中占主导地位,艺术较少依靠理性,而主要依靠感性。感性所涉及的都是不可道、不可知的,并涉及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所拒斥的神秘主义。

科学虽也强调灵感等感性因素,但更依赖理性,灵感也是为了激发认识事物自然规律的理性。此外,主体性导致了操作的误差与不确定性,这在科学中是应当避免但又不可避免的,而在艺术中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艺术本身。

然而,人类拥有的知识丰富多彩,难以作科学与艺术的截然两分。没有纯粹的科学,也没有纯粹的艺术,一般而言,知识皆包含这两种成分,而两者也并非对半开。正因如此,称某种知识为“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种讨巧又笼统的说法,关键还要看怎样“统一”。在人们所有的知识中,有的偏向于科学,有的偏向于艺术,为简便起见,我们径直称其为科学或艺术,同时也视其为科学或艺术的范例,正如我们视猫、虎、狗,而不是鲸为哺乳动物的范例。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能分辨某种知识中科学与艺术哪个占主要部分,有时候则难以分辨(比如建筑学)。人类知识可以说好比一张渐变色谱,科学与艺术各占一端,越靠近交界处,越暧昧难辨。

“科学与艺术的统一”还有一种情况:有些知识既有准科学的味道,又和艺术相关联(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但不能简单将其归为科学或艺术,且难以将其与建筑学看成同类,这类知识通常被称为“技”。“技能”、“科技”、“技艺”这三个词体现了技和能力、科学、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波兰尼的哲学中,技(skill)指技能,它是一种默会知识,就如你学会了游泳和骑车,却说不出是如何学会的。科学与艺术都需要技,但又不止于技。在道家哲学中,技不仅指技能,还泛指形而下之“器”层面的日常劳作,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庄子也认为技是不可道的,斫轮的要诀在于“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16]358}。所谓“数”,即实践中“度”的拿捏,这完全是默会的。技的臻于完美,靠的是对“道”的体悟。文惠君问庖丁解牛之技何以如此精湛,庖丁答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16]96}可见,技与“道”虽是形下与形上两个层次,但两者并非扞格难通,技必须从“道”的高度观之,“道”也须在技的层面获得。因此,在庄子看来,“道”甚至在“蝼蚁”、“稊稗”、“瓦甓”、“屎溺”等“何其下邪”之处^{[16]574-575}。确切地说,技是准科学与准艺术的统一。我们显然很难把解牛、斫轮与研究导弹、人工智能,或音乐、绘画与文学看成一类东西。科学除了技,还需要理性思维;艺术除了技,还需要“道”层面的追求。

现在,回到翻译上来。翻译毋庸置疑具有艺术性,也具有科学性,但不宜简单地宣称翻译是艺术与

科学的统一。劳陇曾批评过这一观点,他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翻译虽不乏科学性,但总体而言是艺术,不应视其为科学,也不应视其为艺术与科学的统一^[17]。笔者同意劳陇的观点。在科学与艺术这张色谱上,翻译显然偏向于艺术这端。语言学固然对翻译规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机器翻译正是这些解释的应用,不过目前机器翻译的能力十分有限,因为规则还需要应用规则的规则,而这时又需要另一种规则来应用它,这是无穷无尽的,最终只能靠人,而不是靠规则来解决应用的问题。因此,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起主导作用,翻译不靠理性思维,也没有既定的规则,翻译的过程与习得都是不可言传的。

那么,可否将翻译视为技呢?文学家与翻译家常谦虚地称自己从事的不过是“雕虫小技”,这是一种谦辞,还是事实确是如此?如上所述,技可视为准科学与准艺术的统一,而翻译又偏向于艺术,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为:翻译是否够格成为艺术?首先来分辨技与艺的区别。技的复杂程度虽未必亚于艺(如杂技等绝活),但是相对于艺,技是重复性的,有规则可循的,如卖油翁之技靠的是“唯手熟尔”。而在艺术创作中,人们总须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主体性也因此发挥至最大。从这点来看,翻译当属于艺,尤其是文学翻译。此外,技是形而下之“器”,而艺术则近于形而上之“道”。所谓“道法自然”,即意味着艺术源于自然并体现自然,绘画、音乐、文学等艺术莫不如此,但人们一般不会把生活中那些普通技能跟自然联系在一起,除非它们臻于完美,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如上所言,实践智慧靠的是对“度”的把握,翻译也不例外。然而“度”还是‘技’,‘美’才是‘艺’。‘艺’之所以高于‘技’,在于它是‘技’的自由运用。”^[18]当人们读到庄子对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的精彩描写,觉得那简直是种艺术,无处不体现着美;而坏的艺术则会降格为技,正如人们常批评某些艺术品流于匠气。因此,当翻译被称为是艺术,是针对好的翻译(至少是够格称得上翻译的翻译)而言,而糟糕的翻译则只能是黔驴之技了。

四、结 语

本文从翻译的本体、过程与习得三个方面阐释了翻译的默会维度,并认为翻译归根结底是一门艺术,它不同于科学,且高于形而下之“器”层面的“技”。翻译无疑是一项实践,但在人类的各项实践中又具有极高的复杂性与创造性,这是一切“进乎

技”而求道的实践(无疑也是种艺术实践)皆有的特征。无怪乎理查兹(I. A. Richards)称翻译为“或许是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产生的最复杂的一类活动”^[19]。一切实践智慧归根结底都是默会的,靠的是对“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的“度”的把握,翻译实践自不例外。因此尚未有哪位翻译理论家发明出一套有效解决翻译实践的规则,这条道路的受阻也是促成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主要动因之一。此外,在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机器翻译也尚未达到能翻译出令人满意的复杂文本(尤其对于文学作品)的水平。

当然,没有哪一种知识是纯粹言述或者默会的。本文虽主张默会维度在翻译中具有基础性与优先性,但并不否认翻译的言述维度,也不拒斥翻译的言述性研究。翻译的科学研究乃翻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翻译规则的科学阐释正如追求完美译本一样是没有尽头的,这体现了人类天生具有的穷理冲动,也正是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一书高扬的人类之主体性。

参考文献:

- [1]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0.
- [2] 潘文国.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 中国翻译, 2002, 23(1): 31-34.
- [3] 谭载喜. 翻译与翻译原型[J]. 中国翻译, 2011, 32(4): 14-17.
- [4] 叶友珍, 赵正道. 翻译学研究的本体论思考[J]. 外语研究, 2017(5): 83-86.
- [5]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6] 郁振华. 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7] 郁振华. 当代英美认识论的困境及出路:基于默会知识维度[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7): 22-40.
- [8] 迈克尔·波兰尼. 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M]. 徐陶,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9]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9.
- [10] Shuttleworth M,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34-135.
- [11] 王向远. “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并论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挪用与转换[J]. 人文杂志,

2017(10): 62-69.

- [12] 陈嘉映. 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 [13] 田海平. “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3): 4-25.
- [14] 李泽厚, 刘绪源. 中国哲学如何登场? 李泽厚 2011 年谈话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1.
- [15]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韩林合,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19-120.

[16]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7] 劳陇. “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对《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的一点意见[J]. 中国翻译, 2000, 21(4): 62-63.

[18]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41.

[19] Richards L A.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lating [C]//Wright A F.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247-262.

(责任编辑:陈丽琼)